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八年

第**九三四四**次会议

2023年6月12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主席：	沙欣女士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成员：	阿尔巴尼亚	斯塔斯托利先生
	巴西	西尔维拉·布拉奥伊奥斯先生
	中国	耿爽先生
	厄瓜多尔	佩雷斯·卢塞先生
	法国	迪姆·拉比耶夫人
	加蓬	奥南加夫人
	加纳	加苏-阿黑托夫人
	日本	志野夫人
	马耳他	卡米莱里先生
	莫桑比克	费尔南德斯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马科夫先生
	瑞士	尚达夫人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维克拉马辛哈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西蒙诺夫先生

议程项目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601)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3-16543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卢旺达和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法官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首席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先生。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加蒂·桑塔纳法官发言。

加蒂·桑塔纳法官（以英语发言）：没有什么比有罪不罚现象更能助长犯罪了。1993年5月，安全理事会一致同意对前南斯拉夫采取特殊行动，设立国际刑事法庭。这一大胆行动维护了法治，并对其他地方的其他人发出了警告：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是会被容忍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不应不受惩罚。

安全理事会当时的认识是——今天这一认识仍然正确——影响和伤害人类的犯罪行为需要全球追责。1994年设立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时也普遍存在这种感受。2010年设立特设法庭的继承机构——我有幸领导的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就是为了体现我们对于不可或缺的国际司法体系的持续集体承诺。

该机制任务广泛任务，伸张正义、查明真相、维护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权的国际标准，以及最终将那些经证明确定无疑犯有最可怕罪行的人定罪尤其受到重视。

两周前，在检察官诉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案中，上诉分庭就前南斯拉夫冲突期间发生的罪行作出了最后判决。这一判决使前南斯拉

夫问题国际法庭雄心勃勃的旅程宣告结束，因为该法庭起诉的161人的案件已经全部结案。这样就只剩下一个与在卢旺达发生的核心罪行有关的案件——对菲利西安·卡布加的审判。

在向安理会介绍这些诉讼的最新情况之前，我谨缅怀卡布加审判分庭前成员伊丽莎白·伊班达-纳哈姆亚法官。她于今年1月不幸去世，这不仅对余留机制，而且对整个国际法律界都是灾难性的。伊班达-纳哈姆亚法官是一位伟大的法官，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赢得了极大的尊敬。我们非常怀念她的奉献精神、专业精神和对同事的亲切态度。然而，我感到高兴的是，乌干达提名了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女法学家莉迪娅·穆甘贝·萨利法官，她于5月底加入了我们的法官名册。

回到案件上来，6月6日，审判分庭就菲利西安·卡布加的健康状况和未来审判工作作出了裁决。在对所涉问题进行数月的仔细审查后，审案法官以多数票决定，他不适合受审，也不太可能恢复健康，但尽管如此，鉴于公众强烈希望就针对卡布加先生的行为指控得出调查结论，分庭将通过替代调查程序继续诉讼，为卡布加先生提供一个机会来证明他在被控罪行上是无辜的。预计将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

谈到余留机制的其他重要职能，首先我要赞扬检察官逃犯追踪小组的出众素质。他们的工作是余留机制坚定致力于实现其任务授权的又一例证。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剩余四名逃犯之一菲尔让斯·卡伊谢马最近在南非被捕，这清楚地提醒我们，即使在这么多年之后，正义仍然是可以实现的，特别是在有国家合作助力的情况下。

另一项重要事态发展涉及对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移交给卢旺达共和国的三起案件的监测。在我被任命为庭长之前，对让·尤文金迪和贝尔纳·穆尼亚吉沙里的诉讼已于2022年完成。我高兴地指出，今年3月，第三起案件，即检察官诉拉迪斯拉斯·恩塔干兹瓦案的上诉程序也已完成。根据我们的监测人员提交的关于最后这个案件的报告，我谨赞扬卢旺达司法当局为保障正当程序所作的努力，也赞赏卢旺达司法部

和卢旺达惩教署的配合和灵活反应。我还要指出国家检察机关的专业精神和卢旺达律师协会在这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余留机制注意到, 卢旺达提高了高效和有效处理国际犯罪案件的能力, 令人鼓舞。因此, 余留机制相信, 卢旺达司法机构在菲尔让斯·卡伊谢马案的诉讼期间也将同样坚定不移, 我们将根据《规约》第6条第5款规定的监测职能, 密切关注这一进程。

我现在谈谈需要安理会紧急关注和大力支持的三个主要领域。

第一个领域涉及判决的执行。余留机制非常感谢目前正在执行特设法庭或余留机制所作判决的13个国家愿意这样做。这对我们履行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 这一负担分配不均。在执行国服刑的45名被定罪者中, 一半以上被关押在两个非洲国家。在欧洲, 10个执行国正在执行对18名被定罪者的判决。

此外, 在海牙的联合国拘留所, 有四名等待移交给执行国的被定罪者。一些执行国的国内立法限制了它们执行长期徒刑的能力。因此, 余留机制最近面临的情况是, 被定罪者在等待指定新的执行国时, 不得被送回我们的拘留所。不幸的是, 预计这些情况今后将继续发生。这一事态发展也对余留机制的拘留职能产生了不利影响。拘留所本意是作为还押设施, 但现在其中80%的人都是被定罪者。这不仅给余留机制带来财政影响, 也给东道国造成沉重负担。

第二个问题是2021年12月被重新安置到尼日尔的无罪释放或刑满释放人员的情况。首先, 请允许我谈谈我上周末收到的消息, 这些人员中的其中一人Tharcisse Muvunyi先生于星期五晚上去世。余留机制作为优先事项正在获取关于他死亡的具体情况的信息。我谨强调, 尼日尔的局势违反了与联合国缔结的重新安置协议, 余留机制根本无法单独解决这一困境。确实, 安全理事会呼吁所有国家提供必要援助。关于重新安置这些人的任何决定都应符合第2637 (2022) 号决议, 并且不妨碍他们自己为寻求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与此同时, 我敦促安理会认识到

现状在各方面都是难以维持的。

我今天希望提请成员们注意的第三个问题——也可以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威胁——涉及不断有人企图破坏我们目前工作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所作判决的行为。这包括塞尔维亚公然无视安全理事会本身规定的国际法律义务, 而且始终未能逮捕和移交被控干扰司法的佩塔尔·约伊奇和维丽察·拉代塔。值得重申的是, 这种不合作行为阻碍了余留机制履行其受权职能。

此外, 现在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即否认灭绝种族、美化战犯、声称要改写历史的行为, 甚至有被定罪者发表挑衅言论, 无耻地承认他们还会从头再来一次。面对这些挑战, 我的优先事项之一是巩固和维护特设法庭和余留机制的宝贵遗产并使之更容易为人们所了解。

这是第一次有余留机制主席站在安理会面前可以宣布法庭诉讼程序已接近尾声。在这方面, 余留机制只剩卡布加案一个未决案件, 其未来目前尚不明朗。这是余留机制乃至整个国际刑事司法界的一个分水岭时刻。因此, 余留机制已准备好进入其下一阶段的运作——在这一阶段, 其日常职责的实际情况将与其名称和预定性质更加一致。

然而, 余留机制正在缩编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准备关闭。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相反, 我们正准备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机构改革和移交我们受权活动的这项大决定最终将由安理会作出, 但余留机制将继续尽可能精简其活动。正如进展报告所详述的那样, 余留机制过去六个月里在规划其未来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根据我们去年制定的路线图, 所有三个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正在制定一项考虑到各种情况的工作人员队伍计划。此外, 司法职能小组将就余留机制的持续司法活动提出建议。与其他司法机构官员的持续交流加强了这些努力, 这些交流阐明了今后几年我们的余留职能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再过整整一年, 安全理事会将对余留机制的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第五次审查。我决心继续追求创新、更

有效的运作方式，并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继续取得积极成果。在这方面，我期待与内部监督事务厅进行建设性合作，该厅正在开展另一项评价工作。

我们不奢望把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但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最后，我要向所有对我们迄今取得的进展给予至关重要支持的人深表感谢。我们为取得这些进展付出了几多心血，在这里报告这些成果就感到几多欣慰。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加蒂·桑塔纳法官的通报。

我现在请布拉默茨先生发言。

布拉默茨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再次向安全理事会介绍我的办公室的活动和成果。虽然我的书面报告提供了截至5月15日的信息，但我今天的通报将把重点放在过去几周的一些重要事态发展上。

首先，我要表示满意的是，5月23日，我们的头号卢旺达逃犯菲尔让斯·卡伊谢马在南非帕尔被捕。成员们记得，寻找卡伊谢马是我近年来几次通报的主题，在获得必要合作方面遇到的困难也是主题之一。正如我以前解释过的那样，卡伊谢马被指控于1994年4月16日在卢旺达尼扬盖教堂杀害2000多名无辜的妇女、男子、儿童和老年人。据称，他曾企图在教堂内放火焚烧其中的难民。这一企图失败后，他安排了一辆推土机推倒教堂的屋顶，杀死了那些还活着的人。

卡伊谢马被捕是惩罚灭绝种族罪实施者的全球努力的一个标志时刻。这种成果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国际正义的信心。2000名受害者的家人现在将看到卡伊谢马为其被控罪行承担责任。他们30年前遭受的不公可以开始得到纠正。安理会以及联合国再次表明了它们的坚定决心，即确保灭绝种族罪行受到遏制和惩罚，确保暴行罪被追究司法责任问题受到国际关注。这次逮捕也体现了通过国际和国家执法合作可以取得的成果。

虽然我的办公室主导了调查，但许多会员国——

特别是南部非洲的会员国——在将卡伊谢马绳之以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南非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在过去一年里，我的办公室得到了南非当局充分、毫无保留的支持，南非当局设立了一个行动工作队来协助我们的调查。我们共同建立直接业务合作，对我们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最后逮捕之日。

斯威士兰也值得赞扬。斯威士兰当局应我们的要求，迅速成立一个工作队，并同我们的追踪小组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他们的奉献与合作堪称非凡。莫桑比克是另一个重要伙伴。我感谢总检察长接待我的团队并承诺其办公室给予全力支持。

卢旺达当局一如既往地为我们成功作出巨大贡献。检察长、警察总监和其他很多人支持我们在卢旺达开展工作，并确保我们能够取得重要证据。

我的办公室谨向配合我们进行调查的国家和其他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挑战很艰巨，只有通过如此密切的合作，才最终找到并逮捕卡伊谢马。现在只有三名逃犯仍然在逃。我的办公室正在全力以赴查明其下落，并在不久的将来圆满完成这项任务。

卡伊谢马被捕一周之后，余留机制上诉分庭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对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作出了最终判决。我的办公室感到满意的是，上诉分庭认可我们上诉的关键方面。法官同我们一致认为，两名被告作为共同犯罪集团成员，对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犯下的更多罪行都负有刑事责任。

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作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塞尔维亚国家安全机构主管和高级代表，同其他塞族、克罗地亚塞族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有着共同意愿，即对克罗地亚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广大地区的非塞族人进行种族清洗。他们还在一些重要方面促进了共同犯罪活动的实施，尤其是支持臭名昭著的准军事团体的活动。

上诉分庭对他们加重量刑，各判处15年监禁。这项判决是前南国际法庭一个恰如其分的最后篇章。在30年的工作中，我们得以成功起诉冲突各方的政治、

军方和警方高级官员。我们表明了有可能对最严重国际罪行追究责任,同时也把一份所发生事件的记录留作我们的遗产。

我还谨提及审判分庭上周对卡布加一案作出的决定。这项决定还不是最终决定,可能有人会提出上诉。此时此刻,我能说的是,我的办公室认为,对卡布加的审判能够也应当以符合被告权益的方式完成。

菲尔让斯·卡伊谢马被捕以及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件结案是很重要的步骤,使余留机制更接近最终完成其司法活动。在主席领导下,余留机制积极规划它作为一个真正的余留机构的未来。我的办公室充分参与这一进程,并提供我们的意见和支持。我认为,余留机制必须也将在不久之后成为一个比目前更小的机构。这意味着把资源集中用于履行核心职能。

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我的办公室和余留机制法官还有重要工作有待完成。就我们的办公室而言,我们将专心致志执行我们根据第28条第3段承担的任务,即帮助国家司法机构继续对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所犯国际罪行追究责任。这项任务进一步推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结案战略,该项战略预计,即使在阿鲁沙和海牙的审判结束之后,国家法院也将负起责任,继续伸张正义。

正如我的书面报告详细阐述的那样,毫无疑问,在国际一级仍然必须继续伸张正义。在卢旺达,有待起诉的逃犯有1 000多名。我的办公室已经积极努力向检察长办公室移交证据和案卷。

在前南斯拉夫,国家检察官仍然必须处理数千个案件。除了提供证据和法律支助,我的办公室还密集参与解决区域司法合作方面的挑战,而这种合作仍然成问题。此外,世界各国每年在其领土上查找涉嫌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实施犯罪的嫌疑人,然后必须将其引渡或者在国内提起诉讼。

我的办公室发挥关键作用,支持这项继续追究责任的工作。在过去几年里,我们收到比以往更多的援助请求。这是一个积极迹象,因为伸张正义最好是在当地一级落实。很多国家的调查员和检察官指望我的

办公室提供援助,以获取证据、制订调查策略、起草起诉书或者在法庭上证实案件。这种重要援助有助于取得更好的结果,在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得到这种援助。我完全相信,我们将继续赢得安全理事会的支助,以执行这项重要任务,会员国自身则藉此发挥牵头作用,进一步伸张正义并促进和平。

最后,在过去几周,余留机制取得重要成果,使其更加接近完成其最后的特别司法活动。经过20多年之后,卡伊谢马不再是一名逃犯,现在将站在法庭上受审。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上诉案的判决结束了前南国际法庭30年前在海牙开始的重要工作。

与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有关的国际司法程序并不完美。当时需要大量时间,此外,从建设性批评中可以汲取很多经验教训。但是,结果超过预期,是联合国的一项重大成就。仍须继续伸张正义,会员国承诺立即牵头开展这项工作。不久之后,我的办公室将完全侧重于我们未完成的余留职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协助会员国继续追究责任。

最后一条意见是,灭绝种族和美化战争罪犯仍然引起重大关切。国际社会决心使战争罪犯受到审判。在这些审判完成之后,国际社会应当同样致力于宣传真相。我的办公室感谢安理会继续支持我们的所有努力。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布拉默茨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奥南加夫人(加蓬)(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我谨表示我们非常乐于看到你主持本次会议。我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审议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进度报告。

我还要感谢余留机制主席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法官以及塞尔日·布拉默茨检察官就根据第1966(2010)号决议和第2637(2022)号决议第12条提交的国际处理机制工作进度报告所作的通报。

我荣幸地代表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

格扎维埃·比昂大使发言。

我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卢旺达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是在1993年5月安全理事会着手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卢旺达问题法庭来牵头打击有罪不罚现象30年之后举行的。我在此重申，打击有罪不罚是确保加强和平、安全和司法的一项道德要求。因此，它需要国际社会作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赞扬余留机制在报告所述期间，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仍然根据关于司法程序效率和便利性、尊重被告基本权利及保护证人身份的第1966 (2010) 号决议，成功履行余留职能。

加蓬欢迎主席办公室继续把重点放在执行路线图上，路线图的战略特别强调向一个完全的余留机构过渡，当然同时还注重通过公平的进程招聘称职的工作人员来执行余留任务。我们认为，这种优先加强现有工作方法和工具的做法是一种适当的方式，有助于针对性地过渡到该机制最终完成余留职能的阶段。为此，加蓬支持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所有措施，包括与其他司法机构进行非常有益的协商。

关于主席刚才强调的特别敏感的情况，我们鼓励她利用这一战略加深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对各种复杂问题的了解，如追捕逃犯、审理高度敏感案件、向国家司法机构提供技术援助、监测和执行判决、保护受害者和证人、管理和归档文件以及确保余留机制的遗产等。

正在进行的审判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特别是检察官诉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案的结案，这是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重要一步，最重要的是，这肯定了刑事法院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这也给受害者带来了新的希望，让他们知道，无论需要多长时间，他们都会得到正义。经过这么多年的法律程序，包括重审，这一突破现在使余留机制能够专注于检察官诉菲利西安·卡布加案，该案自2022年9月审判开始以来一直处于暂停状态。

余留机制目前正处于关键阶段。它的信誉和效力

将继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从各国得到的援助，特别是各国对塞尔日·布拉默茨检察官的坚定支持。这种不可或缺的支持有助于他逮捕在逃的罪犯及其共犯。在这方面，加蓬欢迎最近逮捕菲尔让斯·卡伊谢马，这标志着余留机制在努力圆满完成过渡进程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的确，如果未能逮捕并按照必要的法律程序审判他，该机制的宗旨可能会被削弱。

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必须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加蓬鼓励有关国家与余留机制的两个分支机构密切合作，以便最大限度地收集必要的证据，开展今后的司法调查——这是劳动密集型工作——以确定犯下的严重罪行的事实。我们借此机会谴责美化犯罪者的行为。

最后，我们希望，这一重要机制的工作将在国际社会的有效协作下不受阻碍地继续下去。除了履行基本任务之外，它的工作还包括寻求真相和正义，筑造对抗任意行动和大规模暴行的道德堡垒。为此，进一步巩固两法庭和余留机制的遗产是加强促进国际刑法的重要资产。

钱达夫人（瑞士）（以法语发言）：瑞士谨感谢加蒂·桑塔纳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的详细通报。我们也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卢旺达和塞尔维亚的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三十年前，安全理事会决定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十年前，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在海牙开始工作。这两个周年纪念提醒我们，国际司法，特别是余留机制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非常重要。本着这一信念，我谨强调四点。

第一，瑞士赞扬余留机制为成功执行其任务所作的努力。我们欣见检察官诉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案已经圆满结案。瑞士同秘书长一道，赞赏参与该案的法官和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我们也欢迎在检察官诉菲利西安·卡布加案中作出的持续努力，并赞扬余留机制与地方当局的密切合作。这有助于体现补充性原则和国家对冲突后问责的自主权。鉴于该机制的缩编和预算限制，这些不同的成就

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该机制，直至其工作完成。

第二，我们回顾，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与余留机制合作，包括配合逮捕和移交逃犯。因此，我们欢迎最近在南非支持下逮捕卡伊谢马先生。另一方面，尽管余留机制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尼日尔重新安置的8名无罪释放或刑满释放者的情况仍然令人担忧。我们鼓励各国遵守与余留机制达成的所有协议，并加紧努力执行判决。

第三，余留机制的工作对于防止发生新的暴行至关重要。问责是翻过过去冲突的一页并建设基于和解与合作的可持续和平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对仇恨言论、美化战犯、历史修正主义以及在西巴尔干和其他地区传播的虚假信息深感关切。这危及和解进程以及多族裔和平共存。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该机制努力帮助受影响群体更好地了解犯下的罪行的事实，并减轻他们的苦难。

最后，我们强调，必须确保保护证人和受害者，同时规划余留机制的未来并确保其工作连续性。在这方面，瑞士注意到该机制为其未来运作所做的精心准备。我们也欢迎为保存余留机制的档案和房地以及将阿鲁沙档案数字化所作的努力，从而保障受害者及其家人了解真相的权利。

毫无疑问，余留机制对过渡期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进而对促进可持续和平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值此具有象征意义的国际刑事司法两个周年纪念之际，让我们表明激励我们前辈的对和平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同样承诺。

迪姆·拉比耶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加蒂·桑塔纳女士和布拉默茨检察官提交该机制的报告并通报情况。我也谨代表法国，借此机会悼念伊丽莎白·伊班达-纳哈姆亚法官，并向她对国际刑事司法的宝贵贡献表示敬意。我们向她的家人和朋友表示诚挚的慰问。

法国重申全力支持余留机制及其为打击有罪不罚

现象和保护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卢旺达问题法庭遗产所作的努力。

过去六个月表明，余留机制决心执行其任务，将所有被特设法庭起诉的人绳之以法。安全理事会必须支持其工作。5月31日对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一案作出的上诉判决标志着余留机制的司法活动进入关键阶段。对受害者来说，这意味着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设立30年后，正义战胜了有罪不罚现象。然而，审判分庭的法官在6月6日的裁决中认定，2020年在法国被捕并移交给余留机制的卡布加先生不适合接受审判，而且今后也不可能接受审判。我们鼓励余留机制设法回应受害者对正义的诉求。

法国敦促所有国家根据其国际义务与该机制合作，并支持它开展活动。但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余留机制主席、首席检察官和许多会员国在安理会的支持下一再发出呼吁，某些伙伴仍然拒绝这样做。当务之急是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其余逃犯绳之以法。在这方面，我们对菲尔让斯·卡伊谢马于5月24日被捕表示欢迎，这要归功于检察官办公室与南非和其他国家当局之间的合作。他的被捕体现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高效和有效的国际合作。在这方面，我应该提到，被指控犯有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菲利普·哈特吉马纳/马尼尔的审判于5月15日开始，并将于6月30日在巴黎重罪法院结束。然而，目前在尼日尔的那些人的命运令人十分关切，法国将继续密切关注他们的命运。

最近的司法工作情况标志着该机制余留活动阶段的开始，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重要活动的完成。我们欢迎机制主席计划为余留机制起草一份完成计划，并鼓励她继续努力，为余留机制的未来管辖权制定备选方案。我们呼吁余留机制的其他机构与机制主席密切合作，我们相信她将以其闻名的领导能力开展工作。在审理与核心罪行有关的案件后，余留机制必须继续履行其基本任务，包括协助国家司法机关、保护受害者和证人、管理档案以及监测判决执行情况。纪念工作对于和解同样至关重要。

我们仍然对否认犯罪行为以及美化国际刑事法庭经过公正和独立诉讼程序定罪的灭绝种族罪犯和战争罪犯的做法深感关切。我们支持余留机制打击各种形式修正主义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机制主席参加纪念仪式、余留机制的提高认识活动、处理藐视法庭案件以及完成法律程序。

最后，我们欢迎任命莉迪亚·穆甘贝·萨利法官进入余留机制的名册，这表明在实现余留机制最高司法职位的平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费尔南德斯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谨感谢你召开本次关于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及时和至关重要的辩论会。我感谢余留机制主席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法官和首席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今天下午所作的颇有见地的通报。我们悲痛地获悉乌干达的伊丽莎白·伊班达-纳哈姆亚法官今年1月份不幸去世。我们与其他人一道，对她为余留机制的工作以及整个国际刑事司法领域做出的宝贵贡献表示敬意。

莫桑比克坚决支持追求国际正义以及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工作，该机制承担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责任和职能。我们想就三点谈谈我们的想法。

首先，就实施国际刑事司法而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安全理事会的首要责任——要求我们评估和提高我们根据国际法针对最严重罪行伸张正义的能力。犯有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人不应逍遥法外。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承认特设国际法庭的历史贡献，设立这些法庭是为了追究应对灭绝种族罪负责者的责任。莫桑比克要赞扬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自承担两法庭职能以来所做的出色工作。正如余留机制主席先前所解释的那样，余留机制在规划未来仅履行余留职能的同时，一直能够开展司法程序。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遗留下来的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一案结案是余留机制应引以为豪的一项成就。这是该机构为灭绝种族罪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历史

性贡献。在我们努力推动针对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所犯罪行伸张正义的过程中，必须切实将受害者置于中心位置。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除司法机制外，还必须考虑揭示真相与促进和解的机制。

第二，关于余留机制与各国之间合作的重要性，我们认识到，余留机制要适当地履行其职能，就需要合作，最重要的是各国遵守关于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的法律义务。莫桑比克鼓励所有国家在需要时迅速与余留机制合作，以便该机制能够完成其工作。我们呼吁各国在执行判决和重新安置无罪释放人员方面与余留机制合作。在执行判决方面，各国必须进行合作，以确保被特设法庭或余留机制定罪的人遵守判决。理想的情况是，应允许被定罪者在原籍国服刑，并由余留机制和其他组织协助支持所在国的这项工作。

第三，关于保存特设法庭和余留机制的遗产，管理和保存记录以及允许公众查阅这些记录对于研究和教育非常重要，并且大大有助于打击否认犯罪的行为和修正主义，也有助于实现我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总体目标。我们鼓励余留机制继续努力应对与管理实物记录和数字化记录有关的挑战。最后，我们注意到，余留机制已经到了从一个全面运作的法院过渡到一个真正的余留机构的关键阶段。我们期待司法职能小组的评估和建议，这些评估和建议终将协助安理会决定余留机制的未来。

最后，我们愿重申，莫桑比克赞赏余留机制取得的成果。我们要向余留机制保证，我们将继续支持其一切努力，并祝其主席和首席检察官圆满完成其崇高使命和关键活动。

Gasu Aheto夫人（加纳）（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法官和该机制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先生向安理会作了富有见地的通报，并向安理会成员概述了该机制的工作进展和面临的挑战。

我国代表团依然深信，余留机制在杜绝有罪不罚现象以及将暴行罪实施者绳之以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将继续支持所做的一切努力，并

与其他代表团开展建设性合作。关于报告的内容，加纳愿提出以下三点。

首先，在合作方面，加纳继续呼吁所有国家根据适用的法律与余留机制合作，移交逃犯，以便使司法程序得以继续并完成。不妨指出，153个国家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暴行罪说“不”，我们敦促依然窝藏身份已查明的逃犯的国家履行其国际义务，交出这些罪犯。我们还呼吁各国在执行判决方面开展合作。

加纳一贯认为，作为一个国际大家庭，我们负有铭记暴行罪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的集体责任，并且有责任不受时间限制地继续要求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我们强调，正义的车轮有时可能会转动缓慢。然而，追究令人发指暴行罪实施者的责任，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也是我们的集体责任。幸存者、其家属和受害者家属能够得到宽慰的唯一途径是将这种令人发指罪行的实施者绳之以法。

关于余留机制在重新安置根据第2529 (2020) 号决议无罪开释者或服满刑期人员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加纳遗憾地指出，鉴于尼日尔退出与联合国签署的合作协议，已被送到尼日尔的这些人员仍然被违背其自身意愿地禁锢在一处安全居所。加纳谨再次提请注意余留机制在执行该决议方面面临的挑战。可以恰如其分地说，国际司法界必须关注并解决无罪开释者和刑满释放人员的处境。

这些人员仍然缺乏自由，这仍然是国际司法的一个污点，也使得对国际司法未能确保和落实基本人权的理由充足的批评历久常存。我们赞扬书记官长努力利用外交、政治和司法渠道解决一些挑战，同时呼吁安理会根据第2637 (2022) 号决议，认真讨论这一事项，取得将有助于余留机制的成果。

加纳愿重申，该决议第5段指出，

“指出关于无罪释放人员和已服满刑期人员重新安置的决定除其他外应考虑到原籍国是否愿意接收其国民、这些人员是否同意或表示反对重新安置以及是否有其他国家可供重新安置”

(第2637 (2022) 号决议，第5段)。

加纳依然深信，第5段为安理会的深入讨论定下了基调。提出这一建议的背景是，将来会有更多此类人员获释。面对这一事实，最近没有多少国家表示有意接纳这些人员。

余留机制将在多长时期内继续承担这种涉及预算问题的责任？

最后，加纳继续赞赏地注意到检察官办公室与国家检察机关之间开展合作，针对大量关于这些罪行的请求，提供获取证据和信息的机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动向，因为它有助于建设检察官办公室在当事国国内起诉方面的能力。

西蒙诺夫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加蒂·桑塔纳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今天通报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为推动追究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所犯暴行的责任正在开展的工作。

自上次通报 (见S/PV.9217) 以来，余留机制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抓获并逮捕逃犯菲尔让斯·卡伊谢马。我们祝贺余留机制和南非当局实施逮捕，并感谢南非在抓捕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卡伊谢马于20多年前被起诉，因涉足在尼扬盖教区教堂残忍杀害2000多名图西族男子、妇女和儿童，而被控犯有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灭绝罪。他的被捕无法追回1994年4月在基伍穆的损失，但我们希望，这将为受害者带来些许安慰：为其亲人伸张正义的斗争将继续下去，有关他们丧生的事实将得以充分披露。我们继续悬赏高达500万美元缉拿余留机制通缉的其余三名卢旺达逃犯。卡伊谢马的被捕定会向所有犯有类似罪行的人发出信息：他们无法逃脱问责。

我们也肯定余留机制最近在检察官诉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一案中所作上诉判决的重要性。这一期待已久的判决确认，上述罪犯作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境内通过迫害、谋杀、驱逐和灭绝人性的行为等犯罪强行驱逐平民的共同犯罪活动的参与者负有责任，该判决是涉及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暴行罪的最后一一起案件，结束了

国际刑事司法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就在30多年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第827(1993)号决议。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是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以来第一个处理暴行罪的国际法庭,证明了国际社会追究对暴行罪负有最大责任者的责任的持久承诺。我们感谢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的法官、律师和法庭其他工作人员数十年来开展的工作及其对前南斯拉夫的法治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所做的巨大贡献。

目前只剩下另外一起涉及核心罪行的案件有待法庭审理,即检察官诉菲利西安·卡布加案,该犯被控充当主要金主,资助在卢旺达境内犯下灭绝种族罪的民兵和政治团体。我们注意到审判分庭上周裁定卡布加不适合受审,并决定采用替代裁决程序。

不幸的是,乌干达的伊丽莎白·伊班达-纳哈米亚法官今年去世,对此我们表示哀悼,她曾在卡布加审判分庭任职,并在余留机制处理其他重要事项。她在国际刑法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我们赞赏并认可她多年来的服务。

正如加蒂·桑塔纳主席的报告指出的那样,该机制现在正准备进入其存续周期的一个新阶段。我们赞赏余留机制努力实现平稳过渡,不再从事审理个案工作,而是把重点放在余留事项法庭的职能上,并从柬埔寨、塞拉利昂和黎巴嫩问题法庭吸取经验教训,了解如何最好地解决重要问题,包括支持国家司法机构以及管理和保存证据。

余留机制之所以取得成功,始终取决于所有国家的合作和支持。我们感谢作为执行国的13个国家,关押那些被定罪的人。它们是该机制成功运作的根本支柱。我们还继续敦促各方为被重新安置的无罪释放和刑满释放人员找到持久解决办法。

我们还高兴地注意到检察官有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和塞尔维亚就战争罪案件加强合作的报告,并高兴地注意到有关克罗地亚司法部长将援助请求转交有关司法当局采取行动的报告。我们希望该地区能够继续在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因为受害者

等待伸张正义的时间已经太久。特别是,我们继续敦促塞尔维亚就约伊奇和拉代塔尚未执行的逮捕令采取行动。

最后,我们赞赏并赞扬受害者和幸存者及其亲人的勇气和毅力,他们继续为正式承认他们所目睹和经历的罪行而斗争。我们承认参与这些审判和其他审判的数千名证人的勇气,没有他们,正义就无法伸张。美国将继续推动正义、互信与和解,以此作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

西尔韦拉·布劳霍斯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主席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法官和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提交的关于该机制活动的最新报告。

我们还就伊丽莎白·伊班达-纳哈米亚法官的去世谨向她的家人和亲人表示慰问。

我们知道,余留机制继承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司法案件和余留职能。这些前法庭是国际刑事司法史上的里程碑。人们不能低估它们对发展国际刑法判例的宝贵贡献,不能低估它们在追究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境内犯下的国际法中最严重罪行的责任方面的作用。保护它们的遗产至关重要。

一年前,安全理事会通过第2637(2022)号决议,允许余留机制再继续工作两年。离检察官和法官目前的任务期限届满还有一年,我们必须承认,余留机制仍然需要时间来完成其授权任务中所负责的工作,履行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余留职能。

尽管余留机制很重要,但它必须在安全理事会的支持下规划完成其所有活动的道路。安全理事会认为余留机制是临时的,其职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为此,我们赞扬余留机制的负责人铭记有必要为完成其司法活动制定明确的时间表。我们还欢迎加蒂·桑塔纳法官所作的出色努力,促进思考如何以最佳方式逐步停止余留机制的活动--不可否认这是一项

复杂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1月份设立了一个司法职能小组，以评估余留机制剩余司法职能的性质和期限。

我们还满意地了解到，余留机制在剩余核心司法案件中取得了进展。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的上诉程序于5月31日结束，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还感谢加蒂·桑塔纳法官主动向安理会成员专家介绍关于菲利西安·卡布加案件的预期时间表，审判分庭于6月7日认定他不宜受审。我们支持审判分庭关于即使在不可能定罪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证据听证的决定。

巴西意识到，尽管在余留机制核心司法案件结案方面取得了进展，但预计该机制仍将履行长期的余留职能。对执行判决的监督就是这种情况。必须执行这项任务，直到最后一名罪犯去世或完成服刑。受害者和证人保护可能是必要的，直到直系亲属的最后一名成员去世。如果出现新的事实，被定罪者也可要求对其案件进行司法审查。

追踪逃犯也是余留机制确保惩处严重罪行的一项关键职能。目前仍有罪犯在逃。在这方面，我们赞扬检察官办公室在逮捕菲尔让斯·卡伊谢马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他在逃20多年，将被引渡到卢旺达进行起诉。保存余留机制的档案也至关重要，我们欢迎它努力传播有关其遗产的信息。余留机制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履行其任务。因此，我们呼吁与该机制充分合作，追踪逃犯，执行尚未执行的逮捕令和移交令，并重新安置无罪释放或刑满释放人员。

巴西重申，认为各国负有首要责任，追究在其领土上犯罪者的罪责。国际法庭是对国家司法机构的补充。当国家机构不能或不愿对这些罪行进行裁决时，国际法庭必须采取行动。互补性原则确保各国保留对其权利的所有权，尤其是为其公民伸张正义的义务。确保追究严重罪行责任的强有力的国家机构能使其社会更具抗击犯罪行为的能力。

卡米莱里先生(马耳他)(以英语发言)：我也感谢加蒂·桑塔纳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通报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正在进行的将在卢旺达和

前南斯拉夫犯下暴行的罪犯绳之以法的工作。我们赞扬他们在推进该机制工作方面发挥的领导力和所作承诺。

我们重视把重点放在剩余的司法工作上，在这方面，我们强调余留机制取得的显著进展。特别是，我们欢迎最近对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作出的判决和最终定罪，并注意到通过检察官办公室逃犯追踪小组与南非当局的联合行动，在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的协助下，逮捕了菲尔让斯·卡伊谢马。这是一个清楚的例子，说明国家合作是司法进程的主要贡献者。这次逮捕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即那些犯下此类罪行的人无法逃脱法律制裁。

如报告所述，余留机制在监督判决执行、回应国家援助请求、保护受害者和证人以及追踪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剩余逃犯方面继续取得进展。此外，该机制为进入其存续周期的下一阶段--即成为一个真正的余留事项处理机制--所进行的周密考虑和准备工作值得赞扬，必须按照第2637(2022)号决议和内部监督事务厅有待落实的各项建议继续下去。

然而，我们认识到，该机制必须继续在执行判决、保存档案、保护证人，特别是协助国家司法机关和其他司法活动方面开展工作，我们要向机制主席保证，我们将予以全力支持。

合作对于确保该机制能够履行其法定职能至关重要。我们敦促各国履行其义务，并与该机制充分合作，尽力逮捕和移交其余逃犯。

此外，马耳他还要指出，2021年12月被重新安置到尼日尔的被判无罪获释人员的持续状况亟需解决。我们呼吁有关国家尊重第2637(2022)号决议的规定，并敦促书记官长继续进行斡旋，以解决这一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刚刚从机制主席和检察官那里听到的那样，我们继续面临不接受历史事实的危险问题。我们赞同检察官呼吁摒弃过去和领导层的华而不实言论，支持和解与建设和平。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该机制与欧洲联盟一道，继续实施受影响社区宣传方案，并欢迎最近推出的《历史教师指南》，该

指南让公众查阅余留机制的司法记录,从而有助于捍卫真相。

我还要欢迎检察官办公室继续努力建设起诉战争罪的国家主管机关的能力,并赞扬该办公室最近为来自斯威士兰的检察官提供关于起诉性暴力犯罪的培训。

最后,请允许我确认,机制主席加蒂·桑塔纳已将解决受害者和幸存者问题定为优先事项,包括最近在阿赫米奇罪行三十周年之际的讲话中作此表态。我们必须继续将受害者,包括妇女和儿童置于我们努力的中心,以推动针对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所犯罪行伸张正义。

马耳他重申其对国际刑事司法的坚定承诺。确保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是一个优先事项。暴行罪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理应得到这一切。

丘马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仔细审查了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和检察官关于该机构过去六个月活动的报告。

最恰当描述余留机制情况的莫过于俄罗斯谚语:“没有什么比临时解决办法更持久的了”。在这方面,我们不断提醒其领导层注意第1966(2010)号决议,其中确定余留机制是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其职能和规模将逐渐缩减,设有与其职能减少相符的少量工作人员。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已经朝着正确方向采取了一些初步步骤,即关闭阿鲁沙拘留中心和萨拉热窝办事处、以及减少一些临时和长期职位。然而,减少的职位数量甚至没有达到先前提交安理会的余留机制本身计划中规定的数目。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计划规定到2023年底至少再减少46个职位。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充分实施,并将继续密切监测该机制履行其承诺的情况。

直到最近,余留机制基本上只有一个针对卡布的未决案件。我们不会算上所谓的藐视法庭案。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该机制不应增加此类别下的

案件,来人为延长其存在。国家法院可以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余留机制规约》第1条第4款允许移交此类案件。

在最近一项裁决中,宣布卡布加因健康原因不适合受审。审判分庭将在卡布加先生不出庭的情况下对其案件的初步事实进行审理,但这并不是基于余留机制的创始文件,因而我们完全不清楚其现状,其实用权宜性令人质疑。这个机制似乎发明了另一种方式来延长其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余留机制的待审案件表上实际上没有任何案件。在这种背景下,在其报告中用再多的平衡言辞也不能证明保留一个由388人组成的庞大官僚机器是合理的。由于许多职位属于该机制过度膨胀的工作人员,我们要求书记官长采取有力措施,尽快减少多余的工作人员。

机制主席加蒂表示打算实施一项战略,将该机制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余留机构,这是恰当的。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一恰当想法在该机制设立10年后才首次提出来。事实上,机制主席承认俄罗斯代表团的正直态度,这些年来,俄罗斯代表团一直表示,该机制未能遵守当初设立该机制的决议的参数,而且完全无视安理会关于其余留、临时和紧凑性质的指示。在这方面,鉴于将该机制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余留机构的工作已经拖延了至少十年,其现任领导层必须大幅加快缩减其工作的步伐。

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内部监督事务厅为该机制制定一套建议和设想,以帮助它最终遵守设立该机制的第1966(2010)号决议所确定的安理会指示,接受其临时性质,并过渡到积极结束其活动。这些建议首先应当旨在从根本上削减工作人员和预算支出。总的来说,我们正在等待关于什么将被关闭、转移或减少以及何时关闭的细节。我们也想知道该机构完成其职能的日期,而该机构最初是作为一个临时机构设立的。

此外,我们要针对与余留机制目前活动有关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尊重被定罪者的基本权利仍然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在安全理事会上次会议(见S/

PV.9217) 上, 我们提到塞尔维亚知识界为正在联合王国服刑的卡拉季奇先生的权利辩护的一封公开信。由于未能从余留机制获得关于此事的信息, 我们尝试询问关押被定罪者的帕克赫斯特监狱。事实表明, 在当地人权活动人士中, 该监狱因其拘留条件而臭名昭著, 拘留条件“不可接受, 而且对被拘留者的健康有害”。英国政府专门委员会1月份的报告指出, 这座监狱的囚犯被剥夺了药物和心理护理。帕克赫斯特监狱的领导层甚至没有否认这一点, 但确实提到缺乏资金。

卡拉季奇先生的女儿Sonja Karadžić-Jovičević也透露了她父亲的拘留条件。正如她所说, 这些条件简直是不人道的。他被没收了所有形式的通讯, 包括书籍和私人信件。他被禁止用母语说话, 据称是出于安全考虑, 担心穆斯林狱友可能会试图夺走他的生命。卡拉季奇先生的律师Goran Petronjjevic也提供了类似的信息, 他还提请注意, 被判刑者没有得到满足其基本文化和宗教需求的权利。具体地说, 最近探望过他的东正教牧师受到了有失尊严的搜身程序, 不得不脱掉他的衣服。

Petronjjevic先生一直在关注正在服刑的其他塞族人的情况。除了据报联合王国和荷兰王国实施的侵权行为外, 据报德国、波兰、法国和爱沙尼亚也经常实施侵权行为。此外, 14名服刑的塞族被定罪者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进行诉讼期间死亡, 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与监狱条件有关的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要求余留机制采取紧急措施纠正这种不可接受的状况, 必须允许卡拉季奇先生和其他被判刑的塞族人在适当条件下服刑。

以下问题与塞族将军拉特科·姆拉迪奇先生有关。我们仍然不确定姆拉迪奇先生在余留机制的拘留设施中是否得到了高质量的医疗援助。鉴于姆拉迪奇先生年事已高, 健康状况不佳, 我们谨回顾《余留机制规约》第26条, 该条授权主席为维护司法公正根据法律一般原则决定免刑或减刑问题。与此同时, 我们希望强调, 在这一具体情况下, 最好不仅考虑人道主义组成部分, 而且考虑与该机制及其前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工作中众所周知的

缺点相关的具体程序特征。

对该塞族将军一案作出最后裁决耗时过长, 令人无法接受, 同时无视核心国际法律人权保护文书、安全理事会重要决议以及余留机制程序和证据规则所载的被告基本权利。总体而言,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目前已提到其创始文件中已明确规定的內容, 即只有在被判刑或被定罪者真正濒临死亡的情况下才能减刑。事实上, 身患重病的拉多斯拉夫·布尔达宁在去世前几天才提前获释。这与人道无关。这仅仅是企图逃避责任, 避免关于拘留设施条件不当和未能提供医疗援助等令人不快的问题。这是一种需要从根本上修改的做法。

我们提请注意, 余留机制检察官在发言中对美化战争罪犯和该区域所有国家不承认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的裁决日益感到关切。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件事的根源并确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塞族人不满意的原因不难理解。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该机制裁决中的反塞族倾向是不可能否认的, 因为被定罪者绝大多数是塞族人。冲突其他当事方的代表收到了少数有罪判决, 而一些当事方代表仅收到屈指可数的此类判决。

国际刑事管辖机构的工作中存在双重标准和政治化。这些双重标准和政治化阻碍了实现持久民族和解, 而这是过渡期正义机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这方面, 余留机制已成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名副其实的后代”。5月31日, 余留机制驳回了塞族安全局代表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的上诉, 他们之前被裁定在1992年夺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沙马茨后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对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的审判可能会成为国际司法史上最漫长、最矛盾的审判之一。审判始于2003年的一份起诉书。2013年,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审判分庭宣判两名被告无罪, 因为他们直接参与前南斯拉夫境内悲惨事件的证据不成立。在上诉过程中,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于2015年12月15日推翻了无罪判决, 并要求进行第二次司法程序。余留机制于

2017年启动了这一程序。直到2021年6月30日,审判分庭才裁定两人犯有指控的所有罪行,并判处他们12年监禁。

证据不足的依据被置之不理,似乎上诉法官从未听说过刑法的核心原则,即案件中的所有疑点都应予以有利于被告的方式解决。然而,他们热切地接受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提出的法律创新,即团伙共同犯罪概念可以适用于将非塞族人驱逐出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领土的指控。这一概念在实践中已经允许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不仅认定那些实际上没有犯罪的人有罪,而且认定那些根本不知道这些罪行已经发生的人有罪。

由于这种“创造性”,无罪判决被推翻并完全颠倒过来。上诉程序一直拖到最近,即2023年5月31日,导致这两人的刑期从12年增加到15年。

这种情况可能只发生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每进行一次新的审判,被告的情况只会变得更糟。也许这只是因为考虑到羁押时间,他们已经服完刑期,因此需要在最后一刻增加一些东西。

我们认为,这一判决是对保护人权领域的核心国际法律文书规定的公开嘲弄,特别是对享有《余留机制规约》所反映的迅速、公正的司法程序权利的嘲弄。我们认为,由于这种质量的裁决,根本不可能实现持久的民族和解。

我感谢口译员出色的口译。

斯塔斯托利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加蒂·桑塔纳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提交了有见地的报告并作了详尽通报。阿尔巴尼亚赞扬他们充分按照其任务授权,为伸张正义所作的努力和奉献。我们对乌干达的伊丽莎白·伊班达-纳哈姆亚法官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对她所做的工作和留下的遗产表示敬意。

首先,请允许我指出,阿尔巴尼亚坚决支持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作为一个国际司法机构在对国际刑法规定的最严重罪行追究责

任方面开展工作。余留机制通过追究责任,为和解、和平与稳定奠定基础。余留机制于5月31日作出裁决,决定扩大对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的定罪,而不是宣告他们无罪,这是在巴尔干寻求正义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我们赞扬检察官办公室和追踪小组所做的宝贵工作,他们成功找到并逮捕了卡伊谢马先生,这确实是过渡期正义的另一个里程碑式成就。

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卡布加先生被宣布不适合受审。阿尔巴尼亚与受害者及其家属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努力寻求正义。

在为巴尔干地区的暴行伸张正义方面取得的这些切实成果表明了余留机制工作的价值。但是,确实需要所有会员国的积极支持与合作,使余留机制能够伸张正义,倾听巴尔干以及其他地区成千上万受害者及其家属伸张正义的要求。会员国有义务与余留机制合作,毫不拖延地逮捕、移交人犯并执行逮捕令。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与该机制充分、真诚地合作。

在这方面,我们对持续拒绝与该机制合作的行为感到遗憾。特别是,塞尔维亚必须迅速执行对约伊奇和拉代塔的逮捕令,确保他们受到法律制裁。不与余留机制充分、真诚地合作,不仅违反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裁决,也冒犯和玷污对世界各地成千上万受害者,尤其是斯雷布雷尼察、武科瓦尔和拉查克的受害者的记忆。

这些暴行是巴尔干最黑暗篇章的一部分,需要得到妥善处理,以便在该区域内外开启和解与持久和平的新篇章。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煽动暴力和否认暴行的行为,以及谴责美化战争罪犯的行为,对于防止令人发指的罪行重演、正确认识这些罪行在整个巴尔干地区的持续影响以及大步迈向更有希望的未来至关重要。

最后,阿尔巴尼亚重申,我们坚决支持国际法院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在各地伸张正义。安全理事会必须确保余留机制获得充分履行任务授权所需的资源。

志野夫人(日本)(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加蒂·桑塔纳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内容翔实的报告和通报。

我谨对伊丽莎白·伊班达-纳哈姆亚法官逝世表示衷心哀悼，并感谢她的奉献精神，特别是在卡布加案上的专注工作。我还要向她的家人、朋友以及同事表示同情和支持。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在调查和起诉方面取得了进展。日本致力于促进法治，包括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推行过渡期正义，因此支持余留机制的作用。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与该机制合作。

日本欢迎最近逮捕了菲尔让斯·卡伊谢马，他被指控残暴杀害了2000多名图西族难民，长期受到通缉。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些被指控犯下此类罪行的人无法逃避法律制裁，终将被追究责任，即使是在逾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我们赞扬检察官及其团队作出的努力，我们也赞扬南非、斯威士兰、莫桑比克和卢旺达的重要支持。我们希望其余三名逃犯将在不久的将来被绳之以法。

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结案，这是余留机制处理的剩余两个案件之一。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成立30年后，我们终于看到它完成了安全理事会赋予它的任务。关于另一个未决案件，即卡布加案，我们注意到审判分庭决定采用“审理事实”程序。日本希望这些程序终将查明真相，促进未来的和解。

日本认识到，公正、合法的正当程序需要时间。另一方面，对于受害者和社会来说，必须尽快伸张正义。我们鼓励余留机制在明确、合理的时间表内推进其审理工作，并利用其积累的信息、证据和专门知识，与国家当局合作，帮助它们努力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在这方面，我们承认，余留机制继续发挥着有限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便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我要再次重申，日本坚定不移地支持该机制的活动。我们致力于与其他会员国和国际司法机构，包括余留机制一道促进法治。

耿爽先生（中国）：中方感谢桑塔纳庭长和布拉默茨检察官所作报告，对纳哈米亚法官的逝世表

达哀悼。

本报告期间内，余留机制有序推进司法活动，进一步向真正的余留机构转型，早于预估时间表对一个上诉案件作出判决。该判决标志着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转交给余留机制的案件已全部审结，对余留机制推进其他案件的审理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根据安理会相关决议，余留机制应是一个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中方希望余留机制继续按照安理会决议授权开展活动，逐步缩减其职能和规模。随着案件数量和司法职能减少，余留机制应合理压缩开支，进一步优化财政资源分配，重点保障司法活动。余留机制与有关国家开展务实有效合作对于其完成授权、推进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移交案件、追查逃犯、重新安置无罪和刑满释放人员等问题，中方希望余留机制与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借鉴国际刑庭成功实践，找到妥善解决办法，携手打击有罪不罚。

我愿借此机会感谢安理会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国加蓬和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在协调安理会与余留机制工作方面所做工作。

维克勒马辛格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注意到伊班达-纳哈姆亚法官的突然不幸逝世，并铭记她对国际司法的重要贡献。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指出，她在检察官诉拉特科·姆拉迪奇和检察官诉菲利西安·卡布加这两个案件中所做的工作堪称典范。我还要借此机会欢迎任命穆甘贝·萨利法官，并祝愿她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

关于今天的通报，我要感谢加蒂·桑塔纳庭长和布拉默茨检察官介绍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报告，并感谢他们今天的发言。在过去六个月里，余留机制继续在他们的指导下，及时、有效地履行任务授权。最近取得的两项成就就反映了这一点。

第一，对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作出最后判决，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主要案件的审理工作划上句号，堪称

国际司法的里程碑。对他们的判决虽然是在其犯罪多年后作出的,但意义重大,表明国际社会打击最严重罪行有罪不罚现象的努力并未停止。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的判决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冲突期间平民遭受苦难的记录的一部分。我们铭记受害者和幸存者,并赞扬所有勇敢地提供合作、支持司法进程的人。

第二,最近逮捕了菲尔让斯·卡伊谢马。继最近纪念了1994年卢旺达境内针对图西人的灭绝种族事件第二十九个纪念日之后,卡伊谢马先生被捕,这清楚地提醒人们,机制一直致力于伸张正义。联合王国谨赞扬余留机制逃犯追踪小组和南非当局在这一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也感谢斯威士兰和莫桑比克当局为这一成就作出的重要贡献。

我们注意到,最近有消息称,审判分庭已裁定菲利西安·卡布加不再适合受审,它将通过替代裁决程序来处理他的案件。我们期待今后了解该案的最新情况,并强调我们致力于追究对图西人犯下灭绝种族罪行者的责任。因此,我们对灭绝种族事件据报持续遭到否认感到关切。这是不可接受的,不仅因为此种行为会给受害者造成影响,而且还因为它不利于国际社会做出努力,确保犯罪分子受到追究,阻止今后的暴行。

虽然针对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国际审判和上诉程序即将结束,但国内的程序仍在继续。我们呼吁所有国家给予合作,支持这些国内程序,以确保人人享有正义。在这方面,余留机制不断报告说,某些国家阻挠在西巴尔干地区开展合作,这些报告仍然令人深感关切。在机制提出请求数年之后,现在也是塞尔维亚逮捕佩塔尔·约伊奇和维丽察·拉代塔并移交机制的时候了。

展望未来,我们注意到,尽管审判阶段即将结束,但机制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有47人在服刑,需要监督,许多证人继续需要保护,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国内诉讼程序需要机制的支持。然而,重要的是尽可能高效地完成剩下的工作,因此,我们欢迎主席在机制转

型成为一个完全的余留机构过程中,专注于机制的未来战略。我们赞扬在这方面正在开展的详细工作,并期待着机制提出建议。

最后,我必须就俄罗斯代表对联合王国当局提出的与卡拉季奇有关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说几句。联合王国对协助机制执行判决感到自豪,并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卡拉季奇没有受到任何虐待。他和其他囚犯受到同样的待遇。他的对外接触受到一些有时限、相称和合法的限制,但这些限制是在他滥用这些特权发表文章,兜售政治信息,否认灭绝种族事件,美化战争罪行之后才实施的——他已被告知这一点。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卡拉季奇本人及其支持者没有认识到,他被判犯有欧洲所目睹的一些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包括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灭绝种族罪行。

佩雷斯·卢斯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加蒂·桑塔纳庭长和布拉默茨检察官的通报,我高兴地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卢旺达和塞尔维亚的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首先,我谨表示,我国支持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在伸张正义以及保护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罪行受害者权利方面发挥作用。机制的工作是打击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境内犯下的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不受惩罚现象的斗争的基本组成部分。

关于我们今天听到的发言,我谨强调三点。

第一,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自上次报告提交(见S/PV.9217)以来,机制在履行其司法职能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这一进展包括上诉分庭5月31日对检察官诉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案作出判决。该判决是国际司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完成所有审判工作,它的作出适逢安全理事会通过设立该法庭的历史性决定三十周年。

我们注意到审判分庭6月6日对检察官诉菲利西安·卡布加案作出的判决,并将密切关注该裁决导致的后续程序性步骤。

我们也谨欢迎任命莉迪亚·穆甘贝·萨利法官，接替不幸于1月去世的伊丽莎白·伊班达-纳哈姆亚法官。

第二，我们强调各国的合作在使机制能够履行其职能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敦促所有国家加强与机制的合作，并提供必要的帮助。我们不能忘记，我们都有责任确保诸如灭绝种族罪行和战争罪行这样的可怕罪行不会不受惩罚。5月24日被控在1994年灭绝种族事件期间组织杀害约2000名图西族难民的菲尔让斯·卡伊谢马在南非被逮捕归案，这显然是各国同余留机制切实合作的结果。我们感谢南非遵守国际刑法规定的义务，给予合作。我们祝贺检察官办公室所做的工作，并鼓励它继续调查，以确定剩余三名逃犯的下落。余留机制应继续帮助各国加强其国家调查和起诉能力，以便它们能够履行确保伸张正义和追究在其境内所犯罪行责任的职责。

第三，我们支持余留机制主席为继续推动余留机制从一个纯粹业务性的法院过渡到一个真正的善后机构而提出的倡议。我们意识到这项工作将在缩减人员编制、执行判决、保护证人和保存档案等方面带来的挑战。设立一个法官小组来评估余留机制剩余司法职能的性质和持续时间及其可能的移交是一项出色的倡议，我国代表团予以支持。实现顺利过渡将是保护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遗产的最有效办法之一。

最后，如果不对否认灭绝种族事件、历史修正主义和美化战争罪犯的做法增多表示关切，那将是我们的失职。这种做法寻求不把受害者当作人来对待，剥夺他们讨回公道的机会。厄瓜多尔谴责并反对所有此类损害有关社区努力实现和解、凝聚和包容的做法。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法官和首席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先生所作的宝贵通报。我欢迎克罗地亚、卢旺达、塞尔维亚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我们也对伊丽莎白·伊班达-纳

哈姆亚法官去世表示真诚哀悼。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重申余留机制在履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余留职能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余留机制的贡献有助于伸张正义；保护战争罪、灭绝种族罪和族裔清洗罪受害者的权利；以及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我们要借此机会重申，国际社会必须处理这些犯罪的根源。仇恨言论、歧视和种族主义往往助长这种犯罪。

我们注意到检察官诉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案的上诉判决，并再次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向幸存者和其他受影响者表示声援。我们继续关注余留机制在履行其核心职能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卡布加案的审判进展。我们希望该案能按时了结。

我们要强调，各国对追究犯罪者责任负有首要责任。与此同时，我们确认，国际机构在实现国际正义方面发挥着补充作用。我们还赞赏余留机制的法官和检察官办公室带头努力精简和完成其未完成的工作。我们赞扬当前为提高余留机制的效力和效率并减少其工作量所做的努力。我们敦促余留机制更加注重未来规划，遵循安全理事会的以下愿景：余留机制应是一个临时和有效的机构，其职能应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直接相关的各国履行义务，同余留机制合作，支持其任务。伸张正义是缅怀受害者的最适当方式。与余留机制的合作显然取得了重大成功，最近将逃犯菲尔让斯·卡伊谢马逮捕归案就表明了这一点，这是余留机制逃犯追踪小组和南非当局共同努力的结果。

最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重申，根据《联合国宪章》加强国际司法和法治，对于国际社会有效实现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卢旺达代表发言。

加泰特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格拉谢拉·加

蒂·桑塔纳法官及其首席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所作的详尽通报。我还要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所作的发言。我们赞赏余留机制与卢旺达政府的合作。我们赞扬检察官最近逮捕灭绝种族罪逃犯菲尔让斯·卡伊谢马,此人是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头号通缉犯之一,已经在逃22年。我们还要对乌干达的伊丽莎白·伊班达-纳哈姆亚法官去世表示哀悼。

我们感谢余留机制提交综合进展报告,并感谢其工作人员继续努力寻求对灭绝种族罪进行司法惩治。我们欢迎南非、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执法机构同联合国调查人员一起提供合作,终于将卡伊谢马逮捕归案。我们尤其感谢南非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卢旺达继续感谢向余留机制检察官办公室和卢旺达检察机关提供合作的国家。

必须强调,余留机制已正式确认卢旺达有能力完全按照国际正当程序标准进行灭绝种族罪审判。近年来,正如布拉默茨检察官在其报告中强调的那样,卢旺达对余留机制移交给它的案件有效地进行了审理和上诉。不过,考虑到上诉案件量巨大,我们继续欢迎余留机制提供持续伙伴合作和支持。我们还希望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人员帮助卢旺达当局克服追捕1000多名灭绝种族罪逃犯这一持续挑战,进一步为卢旺达受害者和幸存者伸张正义。截至6月,卢旺达已向33个国家境内的灭绝种族罪嫌犯和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发出了1148份起诉书。有鉴于此,我们呼吁已经发出起诉书所涉的国家加倍努力,逮捕其管辖范围内的其余逃犯。

为针对图西族的灭绝种族行为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伸张正义,仅仅提出起诉是不够的,而是要及时伸张正义。这一过程中的每次拖延都等于剥夺正义。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安全理事会的明确授权和司法文书敦促进行合作,但由于某些会员国缺乏合作,司法工作进展缓慢。这种拖延行为不仅阻碍了对正义的追求,也妨碍了犯罪分子接受审判并对其罪行承担责任的机会。余留事项处理机制的审判分庭关于菲利西安·卡布加不适合继续受审的裁定是突显这一问题的最新实例,这对幸存者、受害者和卢旺达全国人民来说是

一个令人深感沮丧的结果。

尽管《余留机制规约》第28条第3款规定协助国家当局起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但我们看到某些国家不愿意合作。在递解出境、引渡或在其境内进行审判等选择是可行的情况下,这种不作为阻碍了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工作。

我们感谢那些通过在其境内引渡或起诉逃犯来表明其致力于伸张正义的国家。它们包括比利时、法国、美利坚合众国、乌干达、荷兰、加拿大、挪威、德国、丹麦、瑞典、马拉维、刚果共和国、芬兰和瑞士。它们的行动强化了这样的信念:追求正义并非不可逾越,而只是需要有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

每年4月,各成员国与我们一起纪念对图西人的灭绝种族行为。他们向我们表达同情,并认可我们的韧性。然而,当我们发出起诉书时,我们的呼吁往往只得到沉默的回应。我们需要会员国对我们寻求正义的努力表示声援,就像它们在我们举行纪念活动时所做的那样。

自1994年的黑暗事件以来,卢旺达和卢旺达人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然而,那场灭绝种族的知名人物和肇事者仍然活跃,灭绝种族的意识形态和煽动行为继续蔓延,这威胁到建立一个真正和平社会的希望。我们要求成员们与我们一起将“永不再犯”的座右铭变成现实。

在我结束发言时,让我们反思幸存者的困境,他们的安宁因得知肇事者仍然逍遥法外而不断受到困扰。他们,甚至我们所有人,都渴望有一天正义不再被拖延,有罪者最终将被追究责任,受害者会因为知道他们的苦难没有被忘记而感到安慰。

请允许我重申,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不是卢旺达应该独自承担的任务。这是我们国际社会必须承担的集体责任。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考虑在针对图西人的灭绝种族期间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幸存者的长期痛苦以及持续有罪不罚现象造成的潜在不稳定。逃犯逍遥法外的每一天,正义就被推迟一天。众所周知,迟到的正义就是否定正义。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现在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表发言。

阿尔卡拉伊先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格拉谢拉·加蒂·桑塔纳女士和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就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工作进展报告所作的通报。我们赞赏根据第2637(2022)号决议提出的要求对剩余任务的详细规划。余留机制工作的继续和妥善完成对于结束国际刑事司法史上的这一历史篇章仍然至关重要。

关于这一点, 我要发表以下意见。

1992年5月, 我们加入国际大家庭并重获独立——这是以高昂和血腥的代价换来的。我们从未像某些人计划的那样同意被一分为二或依附于“什么大国”。因此, 我们遭到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残酷攻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1993年5月, 安全理事会通过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在国际层面对司法做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贡献。这些进展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国际刑事司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们于5月庆祝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成立30周年并欢迎检察官诉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案的最终判决之际, 我认为现在恰逢其时, 应该认可法庭通过其对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开创性裁决, 在不可逆转地改变国际人道法的面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 它有助于形成无可争议的历史记录——这是打击否认罪行和修正主义的一个关键因素。

特别是在检察官诉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案中, 它最终阐明了连国际法院都巧妙回避的问题——塞尔维亚国家官员对1990年代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犯下的罪行负有直接责任, 并且存在一个共同犯罪团伙,

“其成员包括塞尔维亚某些高级政治、军事和警察领导人, 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犯罪目的, 通过种族清洗, 将大多数非塞族人强行永久驱逐出波斯

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大片地区”。

已经不容置疑地证明,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构成灭绝种族行为。现在已经不容置疑地证明, 内战从未发生过, 而是邻国对我们独立、主权的国家发动了野蛮侵略。虽然家属和受害者再也见不到他们的亲人, 但正义已得到伸张。在这之后, 要否认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有点困难了。虽然困难, 但显然总是可能的, 最近曝光的不可想象的事情就是证明, 这是残忍、无耻和不人道的缩影。当战犯达里奥·科迪奇被问及他所犯下的行为是否值得入狱时, 他回答说每一秒钟都是值得的, 他还会再做一次。

否认罪行和改写历史的企图将继续失败。为不正当行为辩解的企图将会失败。所有犯下战争罪行或美化战争罪犯的人, 在历史上都会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与人类最恶劣的成员并列。他们是一丘之貉——都是最丑陋的疾病。但是, 只要这种行为被容忍, 不承担任何后果, 我们就会成为进一步攻击受害者的同谋, 而伤口将永远不会愈合。此外, 正如达里奥·科迪奇直言不讳地表明的那样, 这引发了未来再次发生类似暴行的真实风险。

5月25日这一天曾经被当作青年接力赛来庆祝。1995年的这一天, 从波斯尼亚塞族军队控制的阵地发射的炮弹击中了图兹拉的门区, 夺去了71个年轻的生命。最小的是一个叫桑德罗·卡莱西奇的两岁半男孩。命令炮击图兹拉门区的朱基奇将军于2014年被波斯尼亚国家法院判处20年监禁。不久之后, 他逃到了塞尔维亚。今天, 朱基奇是塞族共和国军队的退役将军。他现在在塞尔维亚, 从那时起就一直在逃避应得的刑期。

这不仅破坏了我们国家之间重建信任和开启前瞻性关系的脆弱进程, 而且还使违背所有文明规范和人性的、正义和法治原则的说法长期存在。清算的日子将不可避免地到来。也许, 仅仅是也许, 它将最终让组成前南斯拉夫的国家走上一条更诚实的道路, 走向真正的和解。只有赎罪, 才能得到宽恕。

约3000名涉嫌在前南斯拉夫犯下战争罪、危害

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人尚未接受司法审判。在所有未决案件中,仅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就有35%以上的案件涉及国内刑事检察当局无法引渡的人,其中63.3%的人位于克罗地亚、黑山或塞尔维亚。余留机制和检察官办公室在这方面的协助至关重要,但切实伸张正义的主要责任现在在于国家司法机构。检察院之间开展有效和公开的区域合作也至关重要。无法引渡嫌疑人或被告,不仅削弱我们各国法院履行其重大责任的总体有效性,还助长有罪不罚现象,阻碍本地区的和解进程。

就我国而言,我们致力于调查、起诉和惩罚所有应对战争罪行负责的人,无论犯罪者是何国籍、种族、宗教或政治或其他派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检察官办公室以及我国较低级别的检察官办公室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查所有尚未结案的战争罪行,并起诉所有潜在的犯罪者,追究其个人或指挥责任。3月30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长会议组建了一个监督机构,负责监测经修订的处理战争罪行国家战略的执行情况。建立了一个具体的次级法律框架,推动执行该战略的目标,提高战争罪行的处理效率和质量。在这方面,对新登记战争罪案件的管理和涌现情况进行控制的规范性框架已使司法系统内登记的未结案战争罪案件数量明显减少。

此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高级司法和检察委员会协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检察官办公室的活动,改进了余留机制根据我国修订战略的战略目标3移交诉讼的职能,有助于根据每个案件的法律复杂性,更好地将战争罪案件分散到各级司法部门。除此以外,我们继续努力,加紧不遗余力地寻找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仍然失踪的6000多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机构与邻国机构开展信息交流合作同样至关重要。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合作是稳定和全面的。我们将继续这种密切合作,努力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即执行我国处理战争罪行的国家战略,推进调查和起诉,并清理现有的积压案件。无论是支持余留机制完成其工作,还

是决心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发生的罪行伸张应有的正义,我们都不会动摇,也不会厌倦。

最后,就个人而言,由于我的任期即将结束,这是我最后一次以目前的身份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我谨感谢所有安理会成员为确保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和平、正义和繁荣而做出的持续贡献。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塞尔维亚代表发言。

斯特万诺维奇先生(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使发表了一通政治言论,我也要谈谈安全理事会今天所审议的相关案例。

20多年前开始的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的诉讼程序结束后,余留机制海牙分支机构不再审理任何一起涉及在前南斯拉夫境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案件。我们愿表示,希望余留机制今后按照第1966(2010)号决议的设计——第2637(2022)号决议对此进行了重申——运作,即“成为一个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其职能和规模将随时间推移逐渐缩减”。

然而,余留机制检察官在其报告中提到了据称的挑战,这些挑战有可能削弱余留机制完成工作的能力。在这方面,再次提到了约伊奇和拉代塔案。无须在此重复在以前的安理会会议上已经说过的内容,也无须重复余留机制决定拒绝将该藐视法庭案移交塞尔维亚共和国司法机构的理由。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提醒所有安理会成员,第2637(2022)号决议第11段明确指出,安全理事会:

“促请余留机制作为其完成工作战略的一部分,于适当时提出移交其余留活动的备选方案”。

此外,国家司法当局的诉讼程序可以促进正义,并增强对国家司法系统的信心。我们要表示,塞尔维亚司法当局随时准备接手任何涉及藐视法庭或作伪证的案件,并充分保证,诉讼将按照正当司法的要求进行,将充分尊重余留机制以及证人和被告的权利。今天,我们也重申我们的请求,并表示,我国随时准备在

余留机制的监督下在塞尔维亚执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判处的徒刑。

阻碍余留机制结束工作的其他障碍包括继续拒绝向我国归还大量文件。一旦归还, 这些文件将不仅将向余留机制开放, 也将向历史学家、研究人员和国家司法当局开放。余留机制仍然持有这些文件, 并且尽管我们不断坚持, 文件归还进程甚至还没有开始, 我们认为这是毫无理由的。

我也要提请安理会注意, 我们认为, 检方对刑事事项区域合作法律框架的理解非常有问题。例如, 在报告中提到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合作的部分, 检察官办公室称, 它曾经指出, 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关于就处理战争罪案件的框架达成协议的长期双边谈判停滞不前, 现状实际上只会造成有罪不罚。在此不妨举一些例子, 例如在我国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境内犯下严重罪行的拉穆什·哈拉迪纳伊; 在波德里涅犯下严重罪行的纳赛尔·奥里奇; 和在克罗地亚境内犯下严重罪行的安特·格托维纳被无罪开释。这些无罪判决也是余留机制遗留问题的一部分, 它们极大地助长了有罪不罚现象, 特别是对在我国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克罗地亚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塞族人民犯下的罪行。

如前所述, 检察官办公室忽视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都是欧洲委员会成员这一事实, 该委员会有适当的刑事事项合作法律框架。我国国家立法以及《欧洲引渡公约》和《欧洲刑事事项互助公约》的适用都确保了这一点, 这两项公约优先于任何规范刑事事项司法互助问题的双边协定。因此, 绝不能像检察官报告那样描述未能达成双边协定一事。关于余留机制检察官办公室对否认罪行和美化被定罪者的指控, 我们感到不得不再次明确阐述我国的立场。塞尔维亚共和国完成了许多诉讼, 在这些诉讼中, 我国支持严惩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罪行, 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或塞族人的罪行。正在进行大量诉讼和调查。我国断然反对任何否认或美化罪行的指控。

我国政府表示希望并期待在余留机制结束最后

诉讼程序之后, 塞尔维亚和余留机制按照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方式开展有效合作。在这方面, 我们还期望余留机制按照《联合国宪章》原则行事。塞尔维亚万岁!

主席 (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现在请克罗地亚代表发言。

西蒙诺维奇先生 (克罗地亚) (以英语发言): 我要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加蒂·桑塔纳法官和布拉默茨检察官提交的报告, 并感谢他们今天作的通报。我们还借此机会向已故伊丽莎白·伊班达-纳哈姆亚法官的家属表示慰问。

余留机制终于对1990年代在克罗地亚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犯下的罪行作出了最后一项判决。针对参与由已故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领导、有克罗地亚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塞族反叛领导人参与的共同犯罪勾当的塞尔维亚安全局前高级官员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作出的这项判决认定, 塞尔维亚领导层同在克罗地亚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犯下的暴行罪有明显的干系。尽管米洛舍维奇未及被判决、在拘留期间就死掉了, 而且令人遗憾的是, 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也没有因他们参与的一长串其他罪行而被定罪, 但我们真诚希望, 这项判决将给受害者带来某种程度的慰藉, 并有助于愈合创伤与实现和解, 有助于本地区的可持续和平与稳定。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 余留机制主席不得不再次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塞尔维亚未能逮捕佩塔尔·约伊奇和维丽察·拉代塔并将其移交给海牙的问题。恐吓和贿赂证人是严重罪行。按照余留机制的逮捕令采取行动是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承担的义务。

克罗地亚仍然充分致力于遵守第1966 (2010) 号决议规定的义务, 即在有关战争罪问题上同其他相邻各国开展建设性、透明、非政治化和基于证据的司法合作。为此, 我们需要重申, 有意义和有成效的合作不是一个单向进程; 除了做到透明和公开之外, 还必须坚持良好做法和国际法律标准。

我们强调,克罗地亚仍在等待塞尔维亚回复我们发出的参加关于处理战争罪行的双边协议第四轮也即最后一轮谈判的邀请。我们坚信,这种双边协议的规定将防止进一步滥用司法互助工具,并有助于最终结束启动不符合国际法律标准的、出于政治动机的程序这一有害做法。

不认可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调查结果和不尊重该法庭法律资格的情况继续发生,要求我们给予充分关注。美化战犯和否认所犯罪行、包括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罪行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些做法会增加受害者的痛苦,阻碍和解,并破坏本地区的稳定。它们还会迷惑乃至毒害子孙后代。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再次提出在查找失踪人员下

落和死者遗骸方面未给予充分合作的问题。确定1807名失踪的克罗地亚公民的下落是我们的长期优先事项。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必须强调,塞尔维亚缺乏分享信息和准许查阅档案的政治意愿仍然是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取得进展的最大障碍。为此,我们重申,确定失踪人员下落,找到死者遗骸并予以妥善安葬,对于了结问题并实现和解至关重要。除了呼吁改善双边合作之外,克罗地亚还敦促余留机制在其剩余的短暂任务期限里优先支持查找失踪人员下落和死者遗骸。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大力支持余留机制开展重要工作以及圆满完成这一工作。

下午5时25分散会。